

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阿西莫格鲁“西式民主优势论”的反思

唐 睿 唐世平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用跨国数据回归来论证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2019年,阿西莫格鲁等人根据1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和多种模型的结果,使西方学界关于西式民主的“优势”形成了“短暂性的共识”。在梳理跨国回归学派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文章重新对这一结论进行检测,在考虑到发达国家对西式民主作用的高估、采用主流政体度量指标,以及减少变量间内生性后,西式民主的作用不再稳健或直接消失。总之,西式民主的“优势”是不确定的。文章认为,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有特定渠道和有条件的。鉴于制度只是“发展的新三角”的其中一个角,关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拓宽视野,不应再局限于政治制度或者是产权。

关键词:经济增长 政治制度 跨国回归学派 “西式民主优势论”

中图分类号:D521,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22)06-0164-12

一、导 论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式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中心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经济发展被视作民主的前提条件,只有经济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才会产生稳固的民主(Lipset, 1959)。冷战结束后,这一关系理论突然发生了从“发展优先”(development first)到“民主优先”(democracy first)的根本性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一大批将西式民主当作自变量、经济增长当作因变量的研究论文在短时间内聚集式发表(Doorespleet, 2019)。这些研究大都秉持相同的理论预设,认为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上的差别,要发展经济就先要采用合理的政治制度。

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一新兴的理论趋势更为关注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通过跨国回归数据来检测两者间的关系,故此也被称为“跨国回归学派”(Cross - Country Regressions, Tang & Tang, 2018)。为论证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这一学派采用了多种计量模型和不同的跨国数据,但实证结果使两者的理论关系更加晦暗难明。普沃斯基和利蒙吉(Przeworski & Limongi, 1993)在1993年所考察的18项采用OLS模型回归的研究发现,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和负面作用的数量是一样的。在1997年,布鲁内蒂(Brunetti, 1997)考察了17项研究:9项认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1项认为有正向作用,1项负向,3项轻微负向,3项轻微正向。

杜库里阿格斯和阿鲁巴索格鲁(Doucoulagos & Ulubasoglu, 2008)考察了截至2005年12月的84项研究中的483个回归结果,其中,15%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且显著的作用,21%为负向但不显著,37%为正向但不显著,27%为正向且显著。从这一结果出发,他们认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正向作用。其后,多伦斯普利特(Doorespleet, 2019)统计了2005~2015年公开发表的回归结

作者简介:唐睿,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果后发现,二者间没有关系的占 71.4%,有显著正向作用的占 14.3%,显著负向作用的占 14.3%。研究结果让怀疑论逐步盛行,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西式民主在整体上对经济发展没有推动作用。

但是,科拉格罗希等(Colagrossi et al., 2020)在 2019 年更为全面地考察了 188 项研究中的 2047 个回归结果,发现 2010~2019 年的研究中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果越来越多。特别是同年阿西莫格鲁等(Acemoglu, Naidu, Restrepo & Robinson, 2019, 以下简称“ANRR”)发表的关于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在长期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代表性成果,使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在该领域获得了“暂时性共识”^①。ANRR 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HHK(Hahn et al., 2001)、GMM(广义矩估计)和半参数估计等多种估计方法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不仅有稳健和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长期来看,在实行西式民主制度 25 年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其他国家平均高 20% 以上。这一结果支持了“西式民主优势论”的共识。从这一经验证据看,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似乎得到了确证。

由于研究中样本设置存在问题、采用学界较少使用的度量指标,以及忽略了变量间的内生性等问题,ANRR 企图解决困扰该领域 30 余年难题的努力可能会白费。第一,在主要模型中,因变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c),样本中涵盖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往往采用西式民主政体,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环境与发展中国家大相径庭,加入这些国家会使西式民主的作用被高估;第二,ANRR 对政体的度量选用了学界较少使用的指标,也未采用主流指标进行检测,这就会让人怀疑是否只有使用这一“独特”指标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第三,一国实施西式民主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大幅经济滑坡,新的政治秩序建立后经济才会逐步恢复,如果以经济衰退的底点作为比较的起点,则会夸大长期上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鉴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所谓“西式民主在经济发展中更具优势”的结论可能站不住脚。

本文通过梳理跨国回归学派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审视学界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上的主要理论脉络及其发展,并聚焦于所谓“西式民主优势论”的研究,检讨 ANRR 在理论与数据上的问题,重新审视其结论,并讨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此外,近年来,反思西式民主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问题^②,本研究可为讨论西式民主的工具性价值,即为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重要的数据、指标、模型设置和理论命题的基础。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梳理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经验结果与发展;介绍 ANRR 关于“西式民主优势论”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与实证证据;按照 ANRR 的研究方法,重新检测其经验证据,并对其模型设置和结论进行反思;最后总结该领域经过 30 多年发展后达成的共识,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命题、经验结果与发展

西式民主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学界主要持三种观点:一是支持民主论,二是反对民主论,三是怀疑论。支持论者认为,首先,在资源运用上,政治领导者的目的是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在西式选举民主制度下,为讨好选民获取选票,其理性行为是将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投资上,而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则更倾向于满足自身需求,或者投入到对国内矛盾的处理上,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源会更少(Wintrobe, 1990)。其次,在制度约束上,西式民主对政府具有制度化水平更高的约束和制衡(North, 1990),政府的掠夺性行为会更少。此外,因为具有更大的“相容利益”与政府任期的制度化更替,西式民主国家更能够保护

^① 科拉格罗希等(Colagrossi et al., 2020)认为,在 2008 年后,该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西式民主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尤其是阿西莫格鲁等人发表在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可谓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阿西莫格鲁是跨国回归学派的领军人物,他运用更为全面的数据与多种检测方法,为“民主优势论”提供了一些证据。其后,虽有学者对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提出质疑,但也仅仅是认为其算法高估了民主的作用,仍同意其主要结论。参见 Eberhardt M., 2019.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Comment.” *C. E. P. R. Discussion Papers*. 13659.

^② 近年来,国内学界发表了多篇反思西式民主的论文。代表性的有:陈尧,2014:“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逻辑与限度”,《政治学研究》,2014,3:18—30;赵卫涛、张树华,2016:“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局限与政治反思”,《政治学研究》,2016,4:46—57+126;白艳等,2017:“透析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历史局限——兼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理论探讨》,2017,5:21—26。

产权,并鼓励长期行为(Olson,1993)。再次,由于具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更开放的媒体和更大规模的致胜者联盟(Mesquita et al.,2002),统治精英会有更强的动机去回应民众。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他们会满足教育、公正和医疗健康等方面的社会需求(Baum & Lake,2003),并力求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Rodrik,1998)。最后,在西式民主制度下,政治系统更为透明、自由和法治(De Haan & Siemann,1995),民众更有意愿去努力工作,并积极进行投资,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反对论者则聚焦于西式民主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一方面,西式民主政府更容易陷入利益集团的泥淖而缺少自主性(Przeworski & Limongi,1993),在遇到有力的反对者时,政府很难推动必要的改革或实施强硬的经济政策(Bhagwati,1982)。正如“李光耀命题”(Lee Thesis)所言(Sen,1999),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发展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高效运转、统一决策,并能够越过利益集团和反对者推动改革,施行“好的政策”(Leftwich,1995)。许多学者从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得出,“中国模式”可能会主导21世纪,而新的“北京共识”或许会取代旧的“华盛顿共识”(Halper,2010)。另一方面,不采用西式民主并非意味着该国没有制度制约,在许多国家中也存在议会和政党,能够有效限制政府掠夺行为并保护产权(Knutsen,2011),促进投资和鼓励长期行为,政府也有充足的动机提供公共产品并有效促进经济增长(Gandhi,2008)。换言之,所谓“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在其他国家中也能够得到“匹配”,这些“优势”并非西式民主所独有(Tang & Tang,2018)。

因此,理论上尚无法推导出西式民主具有明确的“优势”,特别是支持论者所提出的西式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他国家也能出现。既然这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是由政治制度差别所带来的,那么当某一个国家试图发展经济时也能够采用,甚至可以比西式民主做得更好并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Knutsen,2010)。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到经验结果上:从20世纪90年代到ANRR论文发表前的近30年里,支持西式民主的数据结果并不令人信服,与不支持的结果比,数量尚不到半数,且这些结果也往往因不同数据来源、不同测量指标、不同模型工具、不同样本组合、不同时间阶段等而有所差别(Kurzman et al.,2002)。同时,在整体性检测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即将西式民主作为自变量、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放入模型时,往往忽略了二者的内生性对结果的影响。因为政治制度可能会作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影响政治制度的选择。如果剔除内生性的影响,那么现有关于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数据结果大部分会“站不住脚”(Pozuelo et al.,2016)。

由于实证证据的模糊不清,怀疑论逐渐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作用:虽然制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西式民主并不扮演一个关键角色(Doorenspleet,2019)。即使是倾向于支持西式民主的学者也只能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作用,至少在总体上,民主对经济的净效应不是负向的”(Doucouliagos & Ulubasoglu,2008)。虽然已经意识到并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西式民主具有直接作用,但许多学者仍然坚持民主对经济具有正向作用,只是这种作用不是整体的和直接的,而是间接的(Tavares & Wacziarg,2001)。于是,这些学者开始寻找西式民主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中间渠道,试图以此来呈现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在相关的数十条中间渠道中,学者们关注较多且实证结果更好的渠道是产权(Knutsen,2011)、人力资本和公共物品(Baum & Lake,2003;Deacon,2009)、政治稳定(Apergis,2017)和减少经济波动(Quinn & Woolley,2001)等。在这些关于中间渠道的讨论中,学界观点也是不统一的。例如,在人力资本渠道方面,虽然现有研究广泛认为西式民主在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具有优势,而特鲁克斯(Truex,2015)却发现,在采用全局敏感度分析方法(Global Sensitivity Analysis)重新检测后,西式民主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渠道间并没有系统性的关联。同时,除了正向作用的渠道,西式民主也有起负向作用的渠道。例如,西式民主会由于国家能力较弱(Knutsen,2013)、缺乏国家自主性(Alesina & Perotti,1996)、扩大政府开支(Kurzman et al.,2002),以及过多的再分配(Alesina & Rodrik,1994)而影响经济效率。从理论发展上看,从直接作用到间接作用(中介渠道)的探讨是一个重要理论拓展,但进一步使得对西式民主作用的总体性分析变得更加困难。在中间渠道的研究上,学界仅仅确立了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没有直接作

用的认识,尚未提出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也没有明确哪些是政治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所以,不同学者往往按照数据结果提出各种各样的渠道,而在这些渠道中,西式民主在某些渠道中是正向作用,另一些则是负向作用,甚至因为模型、数据和指标等问题,在某些研究中呈现出显著作用的渠道,当重新检测时却不再有稳健的结果。因此,只提出一种或几种具有显著影响的特定渠道将无法估计政治制度的总体作用,在中间渠道上,还需要建立中间渠道分析或政治制度间接作用的理论框架。

除中间渠道外,有学者引入了时间维度来检测政治制度对经济的阶段性作用。普林切特等人(Pritchett et al., 2016)提出了经济发展期(episode)的概念,他们按照经济发展状况将经济发展期分为经济加速期和经济衰退期,并以1960年以来各国经济数据划分出287个发展期。这样,在数据检测中就不再是考察政治制度每一年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是对不同发展期的影响。在经济加速期,西式民主的表现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好,但它能够更有效防止经济衰退,减少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使经济能够更平稳地发展。帕佩约安鲁和瑟让尼斯(Papaioannou & Siourounis, 2008)将西式民主运行的阶段分为初期、中期和长期,他们根据模型结果得出,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但在中期、长期范围内随着政治系统的巩固,经济增长会更快。不同于按面板数据探讨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年度影响,采用时间段考察政治制度在不同发展时期或者更长时期内对经济的影响,这种时间维度上的拓展使人们对政治制度作用的理解更为深入和全面。

在30多年的发展中,跨国回归学派对西式民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从“直接作用”到“中间渠道”的理论扩展,并加入了对时间维度的考察。ANRR在2019年的研究中全面运用了现有研究成果,不仅聚焦于总体作用的探究,而且考察了九条中间渠道,并检测了长时期和25年后西式民主的作用。所以,对ANRR研究成果的全面检讨不仅可以对关于西方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暂时性共识”的实证证据和研究方法进行反省,也可以对跨国回归学派试图呈现西式民主“优势”的种种尝试进行全面审视,发现其研究中的不足与缺陷,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

三、ANRR(2019)的努力:西式民主促进经济增长

ANRR采用了比以往研究更大规模的样本、更为多样和复杂的估计模型与研究方法,为“西式民主优势论”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实证证据,可谓跨国回归学派的标志性成果。

ANRR的研究建立在对两种论点的回应上:一是“强力政府优势论”。这种观点认为,更多的政治权利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Barro, 1997),但政府如果由理性高效的精英所领导,就会具有巨大优势,因为这种强力政府可以推行难度较大却重要的政策以推动经济发展(Friedman, 2009)。二是“西式民主无效论”。过去近50年的实证证据表明,“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净作用是负向的或者没有作用的”(Gerring et al., 2005)。为挑战上述观点,ANRR采用1960~2010年全球1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以动态面板为主的多种计量模型和检测方法,考察西式民主在长期范围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Acemoglu et al., 2019, 下文提及其研究皆出自该论文)。模型结果表明,在长期上,一国采用西式民主制度25年后,其人均GDP会比其他国家高20%~25%,因此,西式民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在长期上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用也更显著。

ANRR的论证策略分为以下几步:首先,在主要自变量西式民主的测量上选用定类数据而非定序数据,将政治制度的区分视作性质上的差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别(Wilson, 2014)。他们对政体类别的编码沿用了2008年帕佩约安鲁和瑟让尼斯(Papaioannou & Siourounis, 2008)研究中的设定,采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自由指数和政体指数(Polity V)作为编码标准,当自由指数为自由或部分自由、政体指数为正时,则视作西式民主,编码为1,其他情形则编码为0。

其次,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因变量为人均GDP,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自变量为西式民主,模型中放入因变量的滞后项,并双向固定年份和国家,模型结果见表1。在表1中,对模型的估计采用了固定效应、广义矩阵估计(GMM)和HHK三种估计方法,为保障结果的稳健性,还分别放入因变量滞后1年、滞

后1~4年以及滞后1~8年等变量,共有三组九列的估计结果^①。西式民主变量在所有模型中都在0.1水平上显著,西式民主的长期效应和西式民主25年后的效应等主要自变量在绝大多数模型中也均在0.1水平上显著,同时,西式民主的长期效应和25年之后的效应在模型中的系数都远大于西式民主的系数,以模型(9)为例,这三个自变量的系数均在0.01水平上显著,数值分别为1.6、35.61和29.05。这表明,西式民主在总体上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健的正向作用,且在长期上以及25年后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表1:ANRR基础模型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GMM模型			HHK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西式民主	0.97*** (0.29)	0.79*** (0.23)	0.89*** (0.25)	0.96** (0.48)	0.88** (0.37)	0.66* (0.38)	0.78* (0.46)	1.17*** (0.37)	1.60*** (0.35)
西式民主的 长期效应	35.59** (14.00)	21.24*** (7.21)	22.01*** (7.74)	17.61* (10.61)	16.45* (8.44)	11.81 (7.83)	12.64 (8.32)	25.27** (10.86)	35.61*** (12.05)
西式民主25年 之后的效应	17.79*** (5.65)	16.90*** (5.30)	17.72*** (5.45)	13.26* (7.28)	14.71** (7.13)	10.50 (6.65)	10.08 (6.27)	20.87*** (7.84)	29.05*** (8.02)
样本数	6445	5994	5350	6270	5819	5175	8925	8925	8874
国家数	175	175	175	175	175	174	174	174	174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再次,采用半参数模型来估计采用西式民主后不同年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差别。其方法以实施西式民主制度当年的人均GDP为参照点,考察西式民主运行后的人均GDP与该点的平均差距,并用这一差距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计算上采用了线性调整、反向倾向性得分重新加权和双重稳健估计三种方法(见表2)。从表2的三种估计模型中可以看出,从15~19期开始,西式民主变量都在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实施西式民主制度15年后,该国的经济水平与其他国家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差距;25年后,25~29期的系数分别约为21.31、22.18和21.79,表明西式民主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平均意义上会比其他国家高20%以上。

表2:半参数模型结果

	-5至-1期	0至4期	5至9期	10至14期	15至19期	20至24期	25至29期
线性调整结果	0.060 (0.156)	2.454* (1.382)	3.621 (2.792)	7.806* (4.416)	14.037*** (5.384)	24.075*** (8.262)	21.310** (9.643)
反向倾向性 得分重新加权	-1.586 (1.478)	3.724** (1.789)	3.214 (3.327)	6.818* (4.848)	13.542** (5.892)	24.111*** (9.035)	22.184* (11.561)
双重稳健估计	0.051 (0.151)	2.795* (1.471)	2.969 (3.067)	6.966 (4.359)	12.947*** (4.881)	23.691*** (7.638)	21.793*** (9.566)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最后,考察西式民主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中间渠道。虽然在基础模型中西式民主在总体上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分析中也需要解释或展示它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ANRR采用与基础模型相同的三种计算方法检测了九条渠道,其中,西式民主在经济改革、税收、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社会稳定和投资等七条渠道中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全要素生产率(TFP)和贸易额上没有显著作用。

至此,ANRR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证据链条,认为西式民主在整体上和长期上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和稳健的正向作用;一国在实施西式民主制度25年后,其经济发展水平要高出20%~25%;在作用机制上,西式民主主要通过经济改革、税收、人力资本、投资和稳定等中间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

^① ANRR原模型包含滞后1期、滞后1~2期、滞后1~4期、滞后1~8期的结果,因滞后1~2期的结果与其他模型没有显著差别,使用三个滞后期的结果也足以呈现其数据结果,在此,不汇报滞后1~2期的结果。

四、“西式民主优势论”的检测:并不存在的正向作用

从表面上看,ANRR 为“西式民主优势论”提供了较为充足和稳健的实证证据,不仅使用了更齐全的样本,而且采用多种计算方法来保障结果的可靠性。但正如跨国回归学派的通病,ANRR 为了力求西式民主显著的正向结果,在论证中也存在样本设置、指标选用和内生性的问题,西式民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并未得到全面考察。

第一,由于样本设置的问题,可能存在高估自变量作用的问题。在 ANRR 的基础模型中,因变量是人均 GDP,目的在于检测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其样本包含全球 175 个国家,不仅有发展中国家,而且纳入了所有发达国家。但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异巨大,在经济发展时所面临的环境也大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不仅可以轻易获取丰富的资源,还能凭借军事和技术优势倾销商品获得巨额的贸易逆差,因而积累了相对优势(张宇燕、高程,2004)。而二战后新兴的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严重滞后,还处于由发达国家支配的世界体系之中,并成为其依附(多斯桑托斯,1999)。因为发达国家大多采用西式民主制度,在样本中放入发达国家无疑会忽略上述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时间和环境等因素,从而存在高估西式民主作用的可能。

为了更准确地估计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在沿用 ANRR 的西式民主指标、模型设定和样本的基础上,去掉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以检测自变量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作用(见表3)^①。表3-1展示了去掉 OECD 国家后的结果: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主要的自变量依然显著,但在 GMM 和 HHK 的模型中,自变量有多处不显著,在 3 个自变量的 6 个模型中共 18 个结果里,显著的仅有 9 处,核心自变量西式民主的作用不再稳健。同时,在 HHK 模型中,因变量滞后 1 年和滞后 1~4 年的模型中,主要的自变量都不显著。与之相比,当将 OECD 国家的数据纳入 GMM 和 HHK 模型中,核心自变量西式民主都有显著作用,主要变量显著的有 14 个。此外,实施西式民主制度 25 年后的效应也发生了变化,纳入 OECD 国家时显著结果的最大值为 29.05,去除后的最大值仅为 21.69。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加入 OECD 国家会使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且稳健,而如果去除掉发达国家,使模型中样本的时间和环境等因素得到更优控制时,西式民主的作用就不再稳健且长期效应也大幅减小。

表 3:对基础模型的重新检测

	固定效应模型			GMM 模型			HHK 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表 3-1 去掉 OECD 国家									
西式民主	0.94 *** (0.31)	0.83 *** (0.24)	0.94 *** (0.26)	0.91 * (0.49)	0.83 ** (0.39)	0.68 * (0.40)	0.51 (0.51)	0.58 (0.42)	1.32 *** (0.40)
西式民主的 长期效应	34.28 ** (13.88)	22.05 *** (7.33)	23.06 *** (7.90)	15.92 (10.12)	14.89 * (8.14)	11.62 (7.73)	6.29 (6.31)	11.48 (8.34)	24.78 *** (8.87)
西式民主 25 年 之后的效应	17.18 *** (5.85)	17.61 *** (5.48)	18.49 *** (5.61)	12.26 * (7.20)	13.48 * (7.04)	10.40 (6.64)	5.54 (5.53)	9.64 (6.94)	21.68 *** (7.10)
样本数	5878	5481	4909	5722	5325	4753	7956	7956	7956
国家数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表 3-2 更换指标(CGV)									
西式民主	0.20 (0.32)	0.32 (0.26)	0.22 (0.28)	-0.25 (0.54)	0.00 (0.42)	-0.53 (0.42)	-2.07 *** (0.46)	-1.26 *** (0.38)	-0.73 * (0.41)

① 如果将发达国家作为控制变量,避免出现删减样本的问题,但因 OECD 国家大都采取西式民主制度,与自变量存在很高的共线性,模型计算时会自动删除该控制变量,因此,只能通过去掉发达国家的方式来检测自变量的作用。

续表 3

	固定效应模型			GMM 模型			HHK 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西式民主的 长期效应	7.70 (12.58)	8.84 (7.44)	5.52 (7.21)	-4.18 (8.94)	0.02 (7.63)	-9.22 (6.82)	-30.48*** (7.45)	-24.60*** (7.72)	-15.47* (9.13)
西式民主 25 年 之后的效应	3.75 (5.98)	7.00 (5.77)	4.43 (5.65)	-3.26 (7.06)	0.02 (6.89)	-8.27 (6.24)	-25.24*** (5.56)	-20.12*** (5.98)	-12.78* (7.32)
表 3-3 更换指标(Polity V)									
西式民主	0.15 (0.33)	0.29 (0.22)	0.37 (0.24)	-0.11 (0.46)	0.22 (0.33)	0.02 (0.34)	-0.10 (0.40)	0.17 (0.30)	0.18 (0.29)
西式民主的 长期效应	5.82 (13.14)	7.95 (6.26)	9.23 (6.24)	-2.30 (9.95)	4.63 (7.17)	0.43 (6.71)	-2.16 (8.44)	4.26 (7.52)	3.77 (6.45)
西式民主 25 年 之后的效应	2.77 (6.24)	6.36 (4.99)	7.45 (4.86)	-1.60 (6.94)	4.02 (6.19)	0.37 (5.84)	-1.51 (5.93)	3.43 (6.02)	3.12 (5.29)
样本数	6445	5994	5350	6270	5819	5175	8925	8925	8874
国家数	175	175	175	175	175	174	174	174	174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第二,存在指标选取上的问题。在自变量的度量上,ANRR 采用的是学界较少使用的指标,即由帕佩约安鲁和瑟让尼斯(Papaioannou & Siourounis, 2008)提出而后续其他学者几乎不再使用的政体指标。学界更为常用和主流的政体指标是 CGV 数据库(Cheibub, 2010)、Polity 数据库(Marshall & Gurr, 2020)和 Boix 数据库(Boix et al., 2014)中的指标。虽然 ANRR 在文章中辩称,之所以采用这一指标是因为政体是类别而不是程度,但 CGV 指标和 Boix 指标本身就是 0、1 编码的定类数据。同时,Polity 指标也可以转换为定类变量,通常做法是把得分大于 5 视作西式民主,编码为 1,其他得分编码为 0(Tang et al., 2017)。表 3-2、3-3 为分别采用同样是定类数据(0、1 编码)的 CGV 指标和 Polity V 指标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了学界主流的政体指标后,西式民主的正向显著作用就完全消失了。在表 3-2 中,更换为 CGV 指标后,自变量西式民主在模型(1)~(6)中没有显著的结果,而在模型(7)~(9)中,竟全部呈现显著但负向的结果;在表 3-3 中,使用 Polity V 指标后,自变量在全部模型中都不显著。这表明,若采用学界主流的政体指标进行检测,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正向作用就会“神奇”消失,甚至还会有负向的显著作用。对 ANRR 而言,就算为了得到理想的结果采用了不常用的指标,也应该用其他主流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测。但他们并没有在该指标上进行任何一项稳健性检测,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只有采用这一学界很少使用的指标,才会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果。

第三,存在因内生性而产生的估计错误。西式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影响到一国是否采用西式民主;另一方面,西式民主也会作用于经济增长。在此之前,有学者估算过内生性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他们删除由经济原因所引起的政治转型事件后发现,现有的关于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的结果都会不显著或不存在(Pozuelo et al., 2016)。在 ANRR 的半参数模型估计中同样也会遇到内生性问题,各国在采用西式民主前往往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动荡(Remmer, 1992),其经济状况会下跌到底点,此后再逐渐恢复。经济状况随政治制度变化而产生的起伏就是两者间内生性作用的重要体现(见图 1)。ANRR 选择采用西式民主当年的人均 GDP 作为比较点,而该点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经济水平的最低点,其他未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则不会经历经济跌到低谷再上升的过程。

在采用半参数模型计算时,西式民主国家的经济变化值是用当年的经济水平与这一低点的差距来计算,这会因内生性问题而高估西式民主的作用。按照 ANRR 的理论,若西式民主长期来看比其他政治制度更能促进经济发展,那么选择此前任意一点作为起点都应该不会对西式民主的正向作用造成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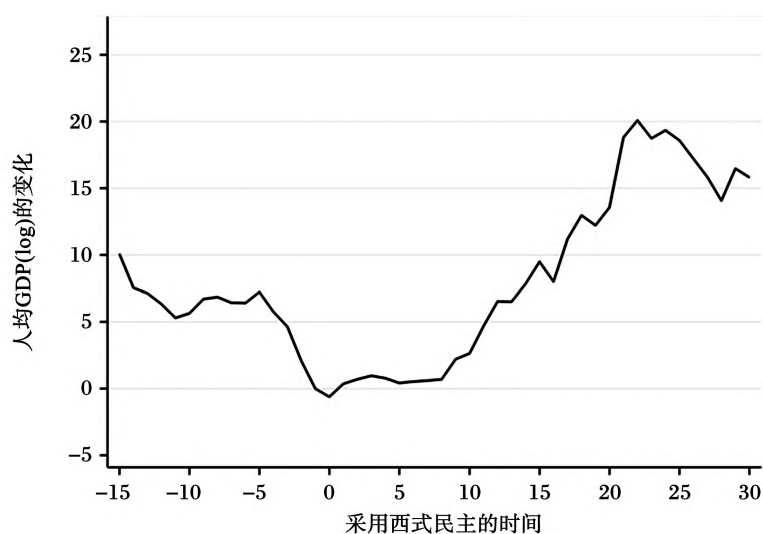


图 1:采用西式民主前后的经济变化状况

因而,我们选择滞后 5 年作为计算差距的起点以检测其结果的稳健性,见表 4^①。在表 4 中的三种计算模型里,在 15~19 期及其后的模型中,仅有三个结果是显著的,且都是线性调整计算,而在其他两种计算方法中,西式民主变量均不显著;在这三个显著的结果中,系数最大值仅为 10.648,对比 ANRR 的原结果(24.075),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幅下降。因此可以认为,如果考虑了内生性的问题,西式民主在长期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其他制度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而 ANRR 在半参数模型中之所以会得到显著正向的结果,是由于他们采用西式民主国家经济下降的底点为比较的起点,将政治失序所导致的经济下跌和政治秩序重建后的经济恢复也算作西式民主的作用,从而夸大了西式民主在长期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通过滞后 5 年的稳健性检测后发现,西式民主不仅在长期上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稳健的正向作用,即使在 25 年后也不会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

表 4:对半参数模型的重新检测

	-5 至 -1 期	0 至 4 期	5 至 9 期	10 至 14 期	15 至 19 期	20 至 24 期	25 至 29 期
线性调整结果	-4.522** (1.926)	-6.415 (4.134)	-3.094 (5.546)	5.957 (6.963)	10.648*** (8.286)	9.166*** (11.332)	9.398*** (16.766)
反向倾向性得分 重新加权	-3.843** (1.597)	-6.459* (3.373)	-4.231 (4.760)	3.856 (6.000)	9.524 (7.442)	10.688 (9.960)	10.709 (14.287)
双重稳健估计	-4.469** (1.800)	-6.337* (3.344)	-3.023 (4.510)	5.976 (5.693)	10.694 (7.490)	10.333 (11.645)	10.871 (19.592)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第四,在中间渠道分析中存在问题。ANRR 并没有建立政治制度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虽然检测了九条渠道,但无法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渠道而不是别的渠道。更重要的是,中介变量是政治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渠道,中间渠道分析分为两段关系,一是政治制度作用于中介变量,二是中介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 ANRR 只检测了政治制度对中介变量的作用,而未进行中介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②。

① ANRR 在半参数模型中未汇报国家和样本数,我们沿用 ANRR 的模型方法,对半参数模型的重新检测所采用的国家和样本数与 ANRR 一致。

② 检测这九条中介渠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仅需要重新建立模型,同时还需要进行严格的稳健性检测。鉴于篇幅和本文的研究目的,不再对这些渠道逐一进行重新检测。

当然,这不只是 ANRR 的问题,整个跨国回归学派在中介渠道研究上都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在西式民主通过哪些主要的中介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上也没有形成共识。因此,ANRR 在中介渠道上的分析至少是不完善的。

总之,ANRR 采用了更全面的样本、更多的计算模型进行了更严格的检测,看似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显著作用提供了证据。但经过上述检测发现,所谓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是不成立的。如果采用学界主流的政体指标,那么西式民主不仅对经济发展没有正向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向影响,即使沿用 ANRR 的“独特”指标,在去除发达国家样本后,西式民主的作用也不再稳健。更重要的是,一旦考虑到内生性,ANRR 所宣称的西式民主在长期上多达 20% 以上的经济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西式民主在总体和长期上的作用都不再显著或稳健时,即使找到九条中介渠道,也无法支持其宣称的理论,更何况关于这些中介渠道的分析尚不完善。总体而言,ANRR 所采用的精巧研究设计和华丽定量技术也不过是再重复这 30 多年来跨国回归学派的“徒劳无功”:用各种方式去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一不牢靠的结果。

五、结 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跨国回归学派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从“发展优先”转换为“民主优先”,主张发展经济需要先采用西式民主制度。但在此后的 30 多年中,该学派都无法为这一观点提供扎实的实证证据。虽然由于 ANRR 的代表性研究的发表,学界形成了所谓“西式民主优势论”的“暂时共识”,但如果考虑到纳入发达国家对西式民主作用的高估、选用的度量指标并非学界主流,以及内生性的问题,他们所展示的西式民主在整体性和长期上对经济的显著正向作用都会消失或不再稳健。可见,以 ANRR 为代表的跨国回归学派只是为了证明西式民主可能并不存在的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而重复堆砌外表华丽但并无实际用处的数据证据而已。

在这数十年里,虽然跨国回归学派为其偏颇的价值倾向堆砌了成千上万个无用回归,但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领域也产出了一些有益的副产品,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基础。一是在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学者们逐步认识到,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直接作用,在整体上也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Easterly, 2011)。二是政治制度会通过中介渠道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作用(Knutson, 2012)。三是粗糙的政体二分法掩盖了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巨大经济差异(Rodrik, 2008),学者们逐渐从对西式民主的关注转移到探讨多种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来。例如,有学者发现,君主制更有助于保护产权(Guillen, 2018)、维护社会稳定(唐睿, 2020),由强力政党领导的国家更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降低婴儿死亡率(McGuire, 2013),且具备长期视野,能吸引更多的投资(Wright, 2008)。

基于此,我们对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核心结论:

第一,西式民主在整体上对经济发展并没有正向作用,即使存在也只能通过一些中介渠道发挥作用,以论证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为目标的研究可以宣告终止。

第二,对政体简单的二分法极大地掩盖了政治制度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很可能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政治制度进一步细分或聚焦于中层制度会丰富关于二者关系的认识。

第三,中介渠道分析拓展了对政治制度作用的理解,即政治制度不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某些渠道间接产生作用。目前对中介变量的分析尚停留在单一链条或对单一变量探讨上,在此可以采用中介因果效应分析方法(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来对多个中介渠道进行整体性分析(Imai et al., 2010)。此外,中间渠道的作用可能是一种复杂的或长链条的作用关系。中介渠道间也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因此,在中介渠道分析上还应进一步厘清变量间的作用关系,拓展政治制度达至经济发展的各个作用环节,建立统一的中介渠道分析框架。

第四,时间维度虽然已经被引入该领域,但仅仅是进行了短期和长期、衰退期和加速期的区分,仍停留在考察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整体作用上,这种分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特征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而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起步时期,能维持稳定秩序的政治系统所起的作用更大,相应地,在经济处于中、高水平时,能够鼓励创新和投资的政治制度就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Tang & Tang, 2018)。因此,在时间维度的分析上应该更具体地区分经济的发展阶段,探讨在不同阶段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

1500 年之前,对经济发展起根本制约的是地理因素(Diamond, 1997);之后,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之一(Tang, 2022)。作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制度设置,政治制度当然会影响经济发展。但是,跨国回归学派 30 多年来试图证明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的努力是失败的。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摒弃政体二分法,转而考察多种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差别,逐步建立和完善中介渠道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引入时间维度以综合考察政治制度的作用。不仅如此,按照唐世平(Tang, 2022)提出的理论框架,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只是“发展的新三角”的其中一个角,另外两个角是政策和国家能力。因此,关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也需要拓宽视野,不应再局限于政治制度或者是产权。

参考文献:

- 唐睿, 2020: “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与经济发展”,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20, 22: 89—116。
- 张宇燕、高程, 2004: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社会科学战线》, 2004, 1: 42—69。
-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1999: 《帝国主义与依附》, 杨衍永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Acemoglu, D., S. Naidu, P. Restrepo, and J. A. Robinson, 2019.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1): 47—100.
- Alesina, A. and R. Perotti,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8(3): 351—371.
- Alesina, A. and D. Rodrik,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109(2): 465—490.
- Apergis, N., 2017. “Democracy and Market Crashes: Evidence from a Worldwide Panel of Countries.”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2(3): 244—248.
- Barro, R. J., 1997. *Getting It Right: Markets and Choices in a Free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 Baum, M. A. and D. A. Lake, 200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Democracy and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2): 333—347.
- Bhagwati, J. N., 1982.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 - Seeking (DUP) Activ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4): 988—1002.
- Boix, C., M. Miller, and S. Rosato, 2014. “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 1800—2007.”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12): 1523—1554.
- Brunetti, A., 1997. “Political Variables in Cross - Country Growth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1(2): 163—190.
- Cheibub, J. A., J. Gandhi, and J. R. Vreeland, 2010.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Revisited.” *Public Choice*. 143(1): 67—101.
- Colagrossi, M., D. Rossignoli, and M. A. Maggioni, 2020. “Does Democracy Cause Growth? A Meta - Analysis (of 2000 Regress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1(3): 1—44.
- De Haan, J. and C. L. J. Siermann, 1995.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emocracy on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conomics*. 20(2): 197—215.
- Deacon, R. T., 2009. “Public Good Provision under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Public Choice*. 139(1): 241—262.
- Diamond, J. M., 1997.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Doorenspleet, R., 2019. *Rethinking the Value of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Doucouliaogou, H. and M. A. Ulubasoglu, 200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 - Analysis Sour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1): 61—83.

- Easterly, W. , 2011. "Benevolent Autocrats." *DRI Working Paper*, No. 75.
- Friedman, T. , 2009. "Our One - Party Dem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09.
- Gandhi, J. , 2008.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rring, J. , P. Bond, W. Barndt, and C. Moreno, 2005. "Democracy and Grow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57(3) : 323 - 364.
- Guillen, M. F. , 2018. "Symbolic Unity, Dynastic Continuity, and Countervailing Power: Monarchies, Republics, and the Economy." *Social Forces*. 97(2) : 607 - 648.
- Hahn, J. , J. A. Hausman, and G. Kuersteiner, 2001. "Bias Correcte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 for Dynamic Panel Models with Fixed Effects." *MIT Dep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01 - 24.
- Halper, S. A. , 2010.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Imai, K. , K. Luke, and T. Dustin, 2010. "A General Approach to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5(4) : 309 - 334.
- Knutsen, C. H. , 2010. "Investigating the Lee Thesis: How Bad Is Democracy for Asian Economie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 451 - 473.
- 2011. "Democracy, Dictatorship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7(1) : 164 - 182.
- 2012.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of Arguments and Results."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15(4) : 393 - 415.
- 2013. "Democracy,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43(1) : 1 - 18.
- Kurzman, C. , R. Werum, and R. E. Burkhart, 2002. "Democracy'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 Pooled Time - Series Analysis, 1951 - 198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7(1) : 3 - 33.
- Leftwich, A. , 1995. "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 Towards a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1(3) : 400 - 427.
- Lipset, S. M. ,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 : 69 - 105.
- Marshall, M. G. and T. R. Gurr, 2020. "Polity 5: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 - 2018."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 McGuire, J. W. , 2013. "Political Regime and Social Performance." *Contemporary Politics*. 19(1) : 55 - 75.
- Mesquita, B. B. de, J. D. Morrow, R. M. Siverson, and A. Smith, 2002.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olicy Choice and the Survival of Leader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4) : 559 - 590.
- North, D. C. ,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 , 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 567 - 576.
- Papaioannou, E. and G. Siourounis, 2008. "Democratisation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118(532) : 1520 - 1551.
- Pozuelo, J. R. , A. Slipowitz, and G. Vuletin, 2016. "Democracy Does Not Cause Growth: The Importance of Endogeneity Arguments." *IDB Working Paper*. No. IDB - WP - 694.
- Pritchett, L. , K. Sen, S. Kar, and S. Raihan, 2016. "Democracy Versus Dictatorship?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Growth Episodes." *ESID Working Paper*. No. 70.
- Przeworski, A. and F. Limongi, 1993.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3) : 51 - 69.
- Quinn, D. P. and J. T. Woolley, 2001. "Democra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3) : 634 - 57.
- Remmer, K. L. , 1992.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7(4) : 3 - 24.
- Rodrik, D. , 1998. "Globalization, Soci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Economy*. 21(1) : 143 - 158.
- 174 —

- 2008.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Tang, M. , N. Huhe, and Q. Zhou, 2017. “Contingent Democratization: When Do Economic Crises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 71 – 90.
- Tang, R. and S. Tang, 2018. “Democracy’s Unique Advantag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Quantitative Evidences for a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Kyklos*. 71(4): 642 – 666.
- Tang, S. , 2022.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vares, J. and R. Wacziarg, 2001. “How Democracy Affects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8): 1341 – 1378.
- Truex, R. , 2015.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Advanta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52(3): 261 – 277.
- Wilson, M. C. , 2014. “A Discreet Critique of Discrete Regime Type Dat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5): 689 – 714.
- Wintrobe, R. , 1990. “The Tinpot and the Totalitari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ctatorshi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3): 849 – 872.
- Wright, J. , 2008. “To Invest or Insure? How Authoritarian Time Horizons Impact Foreign Aid Effectivenes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7): 971 – 1000.

The Relationship of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Rethinking of Acemoglu’s Democratic Advantage Theory

Tang Rui¹ & Tang Shiping²

(1.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Western scholars have adopted cross – national data and argued that democracy does cause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is attempt has failed for four decades. In 2019, using a panel of 175 countries and several different strategies, ANNR estimated th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democracy worldwide and arrived at a positive robustness result. This work makes the effect of democracy on economic growth arrive at a temporary consensus.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 – country regression school, this article re – examines this result. When accounting for the overestimation of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applying the more commonly used measures, and reducing the endogenous among the variables, the advantage of the democracy is not robustness or disappears. To sum up, the advantage that democracy affects growth does not exis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growth is indirect and needs some particular channels and some conditions. Moreover, the institution is only one angl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Triangle”. Therefor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eds to be broadened beyon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r property right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Regime Type; Cross – Country Regression; Democratic Advantage

(责任编辑:王 瑶)